

回顾中外文化大师



北大四才子

徐虹 / 主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新登字 12 号

北大四才子
BEIDASICAIZI
徐 虹主编

责任编辑：吴长安 封面设计：李法明 责任校对：成实 孙洪艳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电力职工大学印刷厂制版
吉林电力职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
字数：390 千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5602-1925-X/I · 103

(全二册) 定价：42.80 元

能够被世代代称作为“才”而受人尊敬的，大抵都有过人的长处。或者以丰厚的学术建树而获学界地位，或者以奇异的思想而破解俗人的难题，或者以豁达的心意而化解苦涩的人情，或者以七步之速斐然成章而让人如痴如醉。才子绝不是一如我们这样的普通人，随时都可能混且淹没在沙砾中，不鸣不响，不奇不崛，不方不圆。

才子都是怪的、傲的、自鸣不平的、自强不息的，才子们的怪毛病本应该得到芸芸众生的容忍与谦让。

因此，我们以自己的平庸而欢呼才子、景慕才子、渴望才子、亲近才子，并且我们也为此而使自己有所觉悟、在他们面前无法陶醉，永远是后学……

——著者谨识

目 录

辜鸿铭：幕府后面的最后一条辫子

- 一、生在南洋 学在西洋 (3)
- 二、反求国学 (35)
- 三、辜鸿铭的跨世纪 (71)
- 四、仕在北洋 (90)
- 五、国变后..... (112)

刘师培：神童出世，平视孔子

- 一、书香世家..... (137)
- 二、扬州青溪旧屋..... (144)
- 三、神童出世..... (151)
- 四、“激烈派第一人”刘先汉 (156)
- 五、少年国学大师..... (163)
- 六、“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 (169)
- 七、新史篇..... (176)
- 八、“三民主义”的反对者 (184)
- 九、无政府的乌托邦..... (191)
- 十、呼唤农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9)

十一、归国·····	(206)
十二、从南京到天津·····	(211)
十三、“夙夜悼心”的日子·····	(218)
十四、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227)
十五、甘苦相随的妻子·····	(236)
十六、人生最后的日子·····	(243)
十七、死后·····	(248)

马寅初：百岁学士与“新人口论”大家

第一部 勤苦求学·····	(259)
第二部 华夏忠魂·····	(275)
第三部 劲节苍松·····	(341)

胡适：诗人·学霸·政坛怪侠

一、童年·····	(383)
二、少有壮志·····	(392)
三、学有所成·····	(399)
四、以飨国人·····	(411)
五、专谈政治·····	(423)
六、情爱故事·····	(436)
七、风云历练·····	(446)
八、与毛泽东交往·····	(453)
九、还胡适本来面目·····	(463)

辜鸿铭：

幕府后面的最后一条辫子

赵 雨 著

-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
仕在北洋
- 精通西方数国语言文化，
又向西方传输宏扬中华文化
- 终生不改忠君保皇立场
- 是集真知与怪诞于一身的
奇才怪杰

辜鸿铭小传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字立诚，福建同安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家庭。10岁时随父布朗赴苏格兰留学。曾入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师从浪漫主义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并深受其影响。187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科就读，并于1878年获工学学士学位。此后又赴巴黎短期进修法文及法学、政治学。1880年返回槟榔屿，随即被派到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供职。辜鸿铭酷爱中华文化，当年即向新加坡殖民地政府递交辞呈，并于1885年投在两广总督张之洞门下，任幕僚长达20年。其间曾参与庚子事变的谈判交涉，并于1905年担任上海黄浦浚治局总办。1907年入外务部，历任员外郎、郎中。1910年获清廷颁授文科进士第二名，同年出任南洋公学校长。辛亥革命后曾避居青岛、北京。1917年始任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系主任。1924年应日本之邀前往讲学，任日本大东文化学院临时教授，1927年返国。1928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辜鸿铭精通数国语言文化，在比较文化学领域有深入、独到的研究。他30岁后返求经史，国学造诣极深，不仅热心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而且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批判近代欧洲，在中学西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辜鸿铭曾获赠博士学位达13个之多，他的学说对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思潮都有深刻的影响。其著作有《读易草堂文集》、《张文襄幕府纪闻》、《春秋大义》、《尊王篇》、《清流传》、《呐喊》等多部，译著有《论语》（英文）、《中庸》（英文）等。

一、生在南洋 学在西洋

●“数典忘祖，方属可耻”

辜鸿铭一生醉心国学，成就之卓著，非凡俗之辈所能理解；境界之深沉亦非后世学人所能轻率评判。他跨越两个世纪的时间，联结东西文化的空间，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书写了浓重而洒落的一笔。传闻中的辜鸿铭是个猖狂可怪之人，建国以后偶有提及他的，也无不冠以“腐朽”、“反动”、“逆流”种种字眼。辜鸿铭生前就深知自己个性的不合时宜，面对俗世的惊讶与排拒却并不怯懦。他“常告人以姓辜之故，谓始祖寔为罪犯”（梁实秋《辜鸿铭先生轶事》），则叛逆而不肯随俗的性情分明来自祖先的恩赐了。但辜鸿铭话锋一转，“又言始祖犯罪，不足引以为羞；若数典忘祖，方属可耻云。”玩笑之间不忘对俗世潮流的批判，这就是辜鸿铭。

辜氏先祖在南昌郡，但辜鸿铭的祖籍是在福建同安。辜鸿铭的祖先从福建同安出发，移到南洋，在马来半岛吉打州的瓜拉武得（Kuala Muda, Kedah）落脚，具体时间已无法详考了。辜鸿铭的曾祖父辜礼欢曾在1786年赠送给在槟榔屿登陆的英国船长赖特（Light）一张渔网，遂被赖特委任为槟榔屿的首任华人“甲必丹”。辜礼欢的任务是协助赖特管理新殖民地的行政工作，他从赖特那里获得贷款，率先在槟榔屿种植胡椒，渐渐成为当地著名的种植家。辜礼欢又中标承包了两个市镇的酒税，并被委任为当地公路委员会唯一的亚籍委员。辜礼欢1826年逝世，遗下了八男三女。其中辜国材承父业，在英人所辖殖民地

从事行政；辜安平年少即送回中国求学，并考中进士，成为林则徐部属，后被调往台湾服务；辜龙池即辜鸿铭的祖父，移居吉打，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立功很多。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则在槟榔屿的双溪吕蒙（Sungei Nibong）牛汝莪胶园（Glugor Estate）做事。从辜鸿铭的家世上看，应该和英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才是：辜家三代都在英人手下工作，辜鸿铭的母亲又是英人（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二），从礼俗习惯到精神气质，都不会不受到英人的影响。谁会料到辜鸿铭并未“数典忘祖”，反倒鼓吹国学，成为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

● 布朗收作养子

清咸丰七年，即公元1857年，辜鸿铭在马来亚槟榔屿降生。是年清廷正苦于英人的连绵炮火，境内洪、杨、捻军之变又呈此起彼伏之势。内忧外患的交困迫使清廷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起用曾国藩、李鸿章等将领，委以湘军军务重任，以图解救民族危亡的困局。满汉矛盾、中外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加深了问题的复杂性：曾、李意欲藉兴办洋务的途径使中国走上近代化之路；洪、杨则试图藉西洋的“耶稣上帝”来构筑抗拒近代化的尘世天国；英法联军的隆隆炮声却已警示了这种分歧的实际价值：兵器船只也罢，“耶稣上帝”也罢，都不过是骄狂的欧洲近代主义的殖民扩张的工具。在殖民地出生的辜鸿铭对这一点的领会极深，可以说对民族命运的忧患感受铸成了他独特的童年体验。

辜鸿铭字汤生，所以他时常署名为“厦门辜汤生”。“汤生”之名大概是取意于《大学》“汤之盘铭”吧。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性情忠厚，一直深得上司布朗（Forbes Scott Brown）的器重，被布朗提拔为牛汝莪胶园的司理。辜鸿铭是辜紫云的次

子，自幼就聪颖非常。辜紫云在家中反复念诵大悲咒，他也笑嘻嘻地跟着父亲一起念，父亲赶他出去他也不走。第二天布朗听说此事，便叫他背一下试试，辜鸿铭居然都背得大致不差。布朗十分喜欢辜鸿铭的天资，就收了辜鸿铭作养子。布朗在经营胶园之前曾有从事学术思想研究的抱负，可惜天赋不够，耐心也差些，终于成了商人。布朗多年来一直藉做生意的机会周游世界各国，到处留心，希望找一个天赋极佳的聪明小孩收作养子，将其培养成会通东西方文化的学术大师，以弥补自己平生之憾。此番找到好朋友兼下属辜紫云的公子，自然非常高兴。等到辜鸿铭满10周岁时，他特地备了一桌丰盛大餐，请来辜紫云和槟榔屿的几位老友聚餐，当众请辜紫云把小辜鸿铭交给他，带到欧洲去留学。就这样，年幼的辜鸿铭随义父布朗一道乘船远行，奔着布朗的家乡苏格兰而去了。

儿时的传奇遭际便是辜鸿铭幸运的开始，也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渊源所在。

●背诵《浮士德》如流水

公元1867年是清同治六年，当时左宗棠正忙着在福建修造轮船，李鸿章也已在南京建起了金陵机械局，史学家张震南先生以为“一时粗有图新之象”（张震南《国史通略·卷下晚清失政》）。这一年辜鸿铭踏上了苏格兰的土地，和布朗家族居住在一起。辜鸿铭被送到当地一所著名的中学，受极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这种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都很认真而彻底地教授，这乃是英国当时的传统。”（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课余时间，布朗就亲自教辜鸿铭学习德文。布朗的教法略异于西方的传统，倒像是中国的私塾。他要求辜鸿铭随他一起背诵歌德的长诗《浮士德》。布朗告诉辜鸿铭：

“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他总是比比划划地边表演边朗诵，要求辜鸿铭模仿着他的动作背诵，始终说说笑笑，轻松有趣。辜鸿铭极想知道《浮士德》书里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坚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讲解。他说：“只求你说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辜鸿铭天资聪明，半年多的工夫便稀里糊涂地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来。布朗又是感慨，又是欢喜，他告诉辜鸿铭，自己小时在父亲逼迫下背诵莎翁作品，勉强记下几句，第二天早上起床就全都忘了。像辜鸿铭这样聪慧勤奋，则自己培养学术大师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辜鸿铭深厚的西文素养极得益于童年背诵《浮士德》的经历。他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诗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西文的妙法，他答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辜鸿铭曾说：“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梁实秋《辜鸿铭先生轶事》）足见童年对“名家著作”《浮士德》能够“背诵如流水”的说法是不虚的。

● “我以为浮士德不是什么好人”

1868年，辜鸿铭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集中学习数学。后半年布朗又请来一位老友教辜鸿铭物理和化学。有了相当的数学基础之后，就觉得学习物理和化学非常轻松愉快了。布朗家中就有科学试验室，辜鸿铭可以把学到的理论一一实践，学习过程是极生动有趣的。

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他认为越是晚讲，了解就越深，因为经典著作不同于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够一听就懂。这段时间里辜鸿铭并没有停顿对《浮士德》的记诵，已经可谓“倒背如流”了。布朗每晚抽出一个多小时来讲《浮士德》，德语、汉语相间，说说笑笑间，讲了三个月的时间。讲完之后，他问辜鸿铭学《浮士德》的感想。辜鸿铭说：“我不仅一下子精熟了德语，而且我的思想也由简单转复杂，由肤浅入渊深了。”

布朗看着在场的教辜鸿铭物理化学的老友，问道：“科学知识不也是由简单肤浅到复杂渊深么？”辜鸿铭答：“科学知识是物质世界的变化规律，越研究，越细密；越细密，越清楚。文学的知识是精神世界的变化动态，越研究，越渺茫；越渺茫，越糊涂。至于文学词句的深奥难解，与科学词句的简明易懂，差别就更大了。要是具体说这部书，则我以为浮士德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上帝不应该派天使救他。”布朗听完辜鸿铭的回答，深深吸了一口气，久久沉默不语。

布朗的老友见布朗陷入沉思，就对辜鸿铭说：“浮士德如何，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几个人能回答的。欧洲研究《浮士德》的人成千上万，发表的批评文章也太多了。但依我看他们都没有资格批评《浮士德》。有批评《浮士德》资格的学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爱丁堡大学的校长卡莱尔。你若有机会应当当面向他请教才是。”

辜鸿铭对浮士德的反感其实也是对近代欧洲文明的反感。已故哲学家方东美教授认为，浮士德精神即为近代欧洲主导的文化理想。近代欧洲人无穷向外拓展的精神在表面上是一种积极的创获，却在其核心埋藏了虚无主义的种子。从辜鸿铭的少年率真之语可以看出他的天性即接近中国文化广大和谐的

精神。

●从戏剧到散文

学完《浮士德》，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虽然莎翁的戏剧也很艰深，但由于辜鸿铭在学校即受严格的英文训练，又身处英语的语言环境之中，所以很快就能和布朗一家人用英语谈笑自如了。布朗采用“随讲随背”的方法，为辜鸿铭定下了半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见辜鸿铭记诵领会奇快，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大约到1870年夏天，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

布朗又询问辜鸿铭学诵莎士比亚戏剧的感想。辜鸿铭回答说：“原来学《浮士德》，感到哲思深远，是是非非，恍恍惚惚，没法分辨，并不好懂。现在看莎士比亚反映现实生活，是是非非，清清楚楚，一望而知，比较好懂。至于文字。莎士比亚和浮士德都美妙极了！”后来辜鸿铭曾在名作《春秋大义》中说，英国文化纯朴却不博大，德国文化博大却不纯朴，不知是否从歌德和莎士比亚的风格比照出来。

布朗认为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将来足可运用自如了。但辜鸿铭只学了诗和戏剧，尚未正式涉及散文。布朗安排辜鸿铭读卡莱尔于1837年写成的史学名著《法国革命》。辜鸿铭此次基本转入自学，自己慢慢读慢慢背，遇有不懂的词句再去请教别人。但只读了三天，辜鸿铭就哭了起来。布朗吃惊地问：“怎么了？”辜鸿铭回答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又问辜鸿铭背诵的进度，发现他每天读三页，于是释然：“你每天读得太多了。背诵散文作品每天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背诵散文同样是求熟不求快，快而不熟则等于没学。”

辜鸿铭所在的中学课业本来是极繁重的，但由于辜鸿铭各科在布朗身边都提前打下了基础，整个学习的过程便显得毫不费力。学校的功课既然顺利，没事时辜鸿铭便接着记诵卡莱尔的《法国革命》。他越读越有兴致，可是读多了便无法背熟。若按布朗的要求慢慢来，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就这样时快时慢地把卡莱尔的《法国革命》读完了。后来辜鸿铭终于征得义父的同意，可以随便阅读义父布朗家中的藏书了。有许多书，辜鸿铭并没有打算背熟，但也在不经意间“过目成诵”了。

● “作一个学者，拯救人类”

清同治九年六月，天津教案发生。后来英、法、美、俄七国舰队齐集天津海口及烟台恫吓，清廷无奈，以赔款、谢罪、镇压人民了结此案。辜鸿铭在苏格兰报章闻知此事，对英法等国的强盗行径叹息不已。他常和义父布朗讨论时局，并极喜欢聆听义父深刻刚正的见解。布朗盼望辜鸿铭有一天能回到中国，深研中国学术经典著作，然后将中国学术思想和欧洲学术思想融汇贯通，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布朗曾为辜鸿铭分析欧美殖民主义的实质，他说：“现在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经变成野兽国家，他们仗恃轮船、火车、枪炮，杀人放火，疯狂侵略别的国家。最惨的是非洲的黑种人，成千上万地被抓走，当作奴隶卖给美国。美洲红种的原住民，快被杀光、灭种了！”以布朗的身分，能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视界为人类而悲叹，足见他立场的公正和识见的清醒。欧美殖民主义的根源何在？多年以后，辜鸿铭在《春秋大义》中阐明，是“可怕的力量——藏在人心中的欲望”。

布朗对养子的寄望极高。他曾告诉辜鸿铭：“我若有你的聪明，甘愿作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作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

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但是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学者却多想学习中国。我希望你能够学通中西，就是为了教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能够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辜鸿铭一生以此来自我期许，所以常常给人以狂怪之感。

依照布朗的计划，辜鸿铭应该先在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然后再到德国学习科学。学成之后才可以回中国修习传统文化。布朗当初确实没有看错，辜鸿铭十四岁时，学术造诣就已经非一般人所能比。他只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不仅初步完成了布朗拟定的家庭教学计划，而且基本上修完了所在中学的各门主要课程。布朗不禁暗自为养子的聪明而感到骄傲。辜鸿铭在学校里初步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其他课程的成绩也都很出色，已经可以申请毕业了。

●初见卡莱尔

大约在1871年底，辜鸿铭顺利通过了全部毕业考试，正式告别了五年的中学生活。刚刚从海外归来的布朗高兴地摆下晚宴，祝贺养子毕业。他带着辜鸿铭到巴黎和柏林观光，每地停留三五天，尽情玩耍的同时简单地领略欧洲各地的风情。归来后就整理好行囊、书籍，亲自送辜鸿铭去爱丁堡，拜见卡莱尔一家。

在卡莱尔家中，辜鸿铭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并且布朗介绍了辜鸿铭的学习进程和自己培养学术大师的愿望。辜鸿铭还简单扼要地讲述了自己记诵《法国革命》一书的心得。当时卡莱尔已经七十六七岁了，和他的大女儿住在一起。卡莱尔父女听了辜鸿铭的情况，连连地鼓掌，最后竟忘情地站起来欢呼，祝辜鸿铭学习成功。谈话间辜鸿铭才知道卡莱尔也是苏格兰人，

而且同布朗的父亲是推心置腹的好友。那就难怪布朗要求辜鸿铭首先从《法国革命》学起了。

卡莱尔在席间对布朗说：“你父亲很生你的气——请原谅我——他说你是一个下流没有希望的人。我没想到你还没忘了你父亲的遗志。”他看了看身边入神倾听的辜鸿铭，又接着说：“今天世界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人类的一线光明也许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据我所知，民主思想，在中国始终没能实现；迨传播到欧洲而后，掀起了法国大革命，可惜又好像一根划着了的火柴，一阵风吹灭了。现在欧洲徒有民主制度而无民主精神。我写《法国革命》时方42岁，想把法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给人们作个参考，使后之革命者尽量少走错误的道路。”

辜鸿铭又小心翼翼地请教革命问题，卡莱尔停了停，回答说：“也许革命是对的，也许革命越艰难，成功越伟大，社会越进步。这可能即是世界发展的规律，谁也阻挡不了。但今日所言革命定非革命的真义。我并没有坚持革命的勇气，我可能疾恶如仇，但杀敌致果却并非我所能。说来说去，因为我是一个文学家，我并不是一个政治家。”

老人语毕，全场肃然。辜鸿铭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卡莱尔的坦诚和理性。事实上，坦诚和理性也成了辜鸿铭一生践行的原则。

● “你遇见了明师”

大约在1872年春季，辜鸿铭正式入爱丁堡大学就读。布朗留住的爱丁堡三个多月，每晚来卡莱尔家和他们父女谈天，辜鸿铭也站在布朗身后认真聆听。三个月中，父女二人解答了布

朗所提的上百个问题，遍及文、史、哲，涵盖整个社会科学。辜鸿铭晚年曾对人讲，他听卡莱尔父女谈论学术“有时，三言两语；有时，千言万语”（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

卡莱尔曾经谈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当时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发生不到一年，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正是欧洲街谈巷议的焦点。由于是私下谈天，可以超出学术立场的局囿，所以卡莱尔讲话也非常率真。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起来通过革命，终有一天会成功。我所担心的是：在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一旦出来一个抛弃民主精神的领导，再革命就更困难了！”卡莱尔总是站在激烈交锋的两方之外独立发言，其所言有温和的批评，但更多的是提醒。

关于卡莱尔的名作《英雄和英雄崇拜》，他也常常谈及。一次卡莱尔曾激动地告诉辜鸿铭：“我内心常有几年无法停歇的思想斗争，后来，我为了为自己解嘲，才写那本《英雄和英雄崇拜》。那时英国有宪章运动，而德国则刚刚成立正义者同盟。我写作《英雄和英雄崇拜》那年是1841年。我常问自己：最后的一步是战争，但战争而后如何？这个念头萦回在我心中许多年，我没能做出我自己的答案。”

布朗临离开爱丁堡时嘱咐辜鸿铭，要把握好跟随卡莱尔求学的机会。他感慨地说：“你们中国人有两句话：盛世难逢，明师难遇。自从有人类社会到现在，还没有逢过盛世，可是，你遇见了明师。”

说起辜鸿铭曾为背诵《法国革命》而哭鼻子的事，布朗又告诫辜鸿铭：“我知道，你不一定还要哭多少次。你哭吧！等你眼泪哭够数，你的学业就够份了！天地间没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的学问，没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好的事情。何况这学通中西、拯救人类的大事业。”说到这里，辜鸿铭又有庄严自信